

全球右翼浪潮兴起及其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

李向阳 周 琪 丁一凡 张 健 田 野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兴起，既包括左翼民粹主义，也包括以民族主义和反经济全球化为特点的右翼民粹主义。西方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文明冲突论的反全球主义叙事逻辑是右翼思潮反全球主义兴起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根源，而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差异则决定了其对反全球主义理念的认知差异。美欧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不仅颠覆了传统政治生态，而且通过政策转向与价值重构，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多维冲击，深刻改变了长期国际合作逻辑。贸易碎片化与供应链重组系统性削弱全球增长动能，民粹主义势力推动的逆全球化趋势正对全球长期增长潜力造成结构性损害。民粹主义带来的冲击将持续考验国际经济体系的韧性，倒逼各国在开放与安全、效率与公平间探索新路径。全球化将进入一个下降周期，国际经济的集团化色彩将逐渐增强。此外，随着西方国家全球主义者与本土主义者之间的“内外”之争日益凸显，欧洲和美国近年来都发生了政党重组。欧洲政党出现了中左和中右的汇合、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汇合。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则在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的维度出现了显著分化。特朗普新政不仅彻底颠覆了民主党政府以往的内外政策，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带来了海啸般的冲击，而且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走向及其对国际社会影响的严肃思考。同时，美欧之间在政治价值观、战略安全和国际秩序等根本性问题上的显著分歧，加深了跨大西洋裂痕。

关键词：右翼浪潮 民粹主义 反全球主义 逆全球化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反全球主义思潮与贸易集团化的发展趋势

李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全球右翼思潮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反全球主义（Anti-globalism）。它与反全球

化 (Anti-globalization) 运动有关,但又不同于后者。如果说反全球化是为了矫正全球化的弊端,寻求“更好的全球化”,那么反全球主义倡导的则是“更少的全球化”。具体而言,反全球主义针对经济全球化,倡导保护主义与本国优先;针对政治与法律的全球化,倡导单边主义、退出国际组织;针对社会与文化的全球化,倡导限制移民和抵制多元文化;针对技术与环境的全球化,倡导技术民族主义和抵制国际气候协定。以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执政为标志,反全球主义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试图从经济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西方反全球主义兴起的动因,同时分析不同类型国家对其认知的差异。展望未来,由于反全球主义的兴起,全球化将进入一个下降周期,多边主义将更多被区域主义替代,国际经济的集团化色彩将逐渐增强。

(一) 反全球主义思潮兴起的根源

反全球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因而探寻其根源必须从西方国家的内部变化入手。

在经济层面,西方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呈现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之势,其中,美国又是最严重的国家。^[1]面对这一趋势,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福利国家模式显得束手无策,无论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都无法予以有效遏制。对此,西方精英阶层自然不会从社会制度出发寻找破解之道。^[2]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主流学者开始把其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问题归咎于全球化的冲击,即基于自由贸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拉低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3]经过西方学界近20年的努力,收入分配不平等源于全球化的叙事逻

[1] Chancel L., “Ten Facts about Inequality in Advanced Economies”, October 2019, [https://wid.world/document/ten-facts-about-inequality-in-advanced-economies-wid-world-working-paper-2019-15/\[2025-04-28\]](https://wid.world/document/ten-facts-about-inequality-in-advanced-economies-wid-world-working-paper-2019-15/[2025-04-28]).

[2] 一个例外是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他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提出,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财富不平等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参见[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3] 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就明确指出,20世纪90年代之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他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都出现错误,低估了发展中国家出口对发达国家就业和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Krugman P., “What Economists (including me) Got Wrong about Globalization: The Models That Scholars Used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Ex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1990s Underestimated the Effect on Jobs and Inequality”, October 10, 2019, [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business/2019/oct/10/wha\[2025-04-28\]](http://www.newindianexpress.com/business/2019/oct/10/wha[2025-04-28]).

辑得以建构，并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认知。^[1]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证明，对民族国家而言，全球化的收益创造与分配在不同阶层、地区和产业之间从来都不可能是完全成比例的。以美国为例，其比较优势决定了高技术产业（硅谷）和金融业（华尔街）是最大的受益者，其他传统产业（“铁锈地带”）则是相对受损者。如何平衡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收益分配是政府的职责。当制度本身决定了政府无法履行这一职责时，寻找外部“替罪羊”就成了一种理想的选择。这就是特朗普政府奉行反全球主义、“美国优先”、保护主义能够获得底层民众（相对受损者）支持的原因所在。

在社会文化层面，反全球主义思潮源于萨缪尔·P.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他提出，冷战后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将让位于普世主义的西方文明、好战的伊斯兰文明与自信的中华文明之间的冲突。换言之，最重要的问题不再是“你站在哪一边”，而是“你是谁”。特朗普从第一任期起就成为这一理论坚定的信奉者和实践者。^[2]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犹太—基督资本主义理念也源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如果说在第一任期，特朗普把美国视为西方文明的“捍卫者”，那么在其第二任期已经转变为把美国视为西方文明的“传承者”。这种角色的转变反映了特朗普政府试图把文明冲突论与“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有机结合起来。文明冲突论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世界，都成为反全球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

在文明冲突论的视野中，以盎格鲁—清教文化（Anglo-Puritan Culture）为核心的西方文明模式具有普适性，而多元文化主义是其最大的威胁。^[3]如果任由全球主义发展，将会产生“世界政府”与“世界公民”。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视野中，过去三十年非白人世界的崛起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打破了西方文明模式具有普适性的认知，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整个西方世界反全球主义与反移民几乎可以画等号的原因所在。

[1] 皮尤于2025年所作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针对美国与中国、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否有益于美国这一问题，美国民众给出肯定性回答的比例分别是10%、10%与16%。参见：Poushter J. and Desilver D., “How Americans View Trade between the U. S. and China, Canada, Mexico”,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2025/4/8/howamericans-view-trade-between-the-U. S. and-China-Canada-Mexico/](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2025/4/8/howamericans-view-trade-between-the-U.-S.-and-China-Canada-Mexico/) [2025-04-28]。

[2] Lozada C., “Samuel Huntington, a Prophet for the Trump Era”, July 18, 2017, <https://www.bunkhistory.org/resources/samuel-huntington-a-prophet-for-the-trump-era> [2025-04-28]。

[3] 甚至以天主教为信仰的拉丁美洲移民都被特朗普视为对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的威胁。事实上，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在与墨西哥的边境上修筑隔离墙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基于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和文明冲突论的反全球主义叙事逻辑反映了西方学术界面对国内外危机的无奈选择，但也必须承认这一思潮客观上已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认知，因而短期内它不会因某个政党（或政治家）的更迭而改变。

（二）反全球主义背景下民族国家诉求的差异性

当反全球主义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认知时，还必须看到，不同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差异决定了其对反全球主义理念的认知也不尽相同，甚至在一国之内不同利益集团的认知也各不相同，比如作为技术全球化的获益者，硅谷对限制移民就持反对立场。

第一，民族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影响其对反全球主义的认知。与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相比，实行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国家更倾向于抵制反全球主义的“本国优先”与贸易保护。以欧盟为例，其区域内贸易的比例一直维持在60%~65%的水平，对区域外国家的贸易收支总体上呈现出顺差，其中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最大。相比之下，美国则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属于典型的内需导向型发展模式。这就决定了欧美在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立场的分歧。

第二，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差异影响其对反全球主义的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全球治理体系整体上是由美国主导的，同时美国也是这一体系下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然而，在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参与现行全球治理的成本大于收益。这就导致其质疑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1]

第三，民族国家在经济与非经济领域的比较优势影响其对反全球主义的认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却牢牢维持着安全领域的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美国向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目前，特朗普政府要利用安全领域的这种比较优势迫使其盟友，如欧洲国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在经济领域作出让步，拟议中的“海湖庄园协议”就建立在这种不对称依赖的基础之上。^[2]

第四，民族国家的人口构成影响其对反全球主义的认知。在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的国家，任何来自其他种族的移民都会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威胁。

[1]Miran S., “A User’ 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November 2024, [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_kx=t83tmar8jfd_rMoKgal2Uw.TFYAKQ\[2025-05-05\]](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_kx=t83tmar8jfd_rMoKgal2Uw.TFYAKQ[2025-05-05]).

[2]Miran S., “A User’ 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 November 2024, [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_kx=t83tmar8jfd_rMoKgal2Uw.TFYAKQ\[2025-05-05\]](https://www.hudsonbaycapital.com/documents/FG/hudsonbay/research/638199_A_Users_Guide_to_Restructuring_the_Global_Trading_System.pdf?_kx=t83tmar8jfd_rMoKgal2Uw.TFYAKQ[2025-05-05]).

除了美国，欧洲国家的右翼势力也越来越敌视外来移民。^[1]

西方国家的这些认知差异决定了反全球主义思潮不会带来一个完全统一的政策导向。

（三）国际经济合作的贸易集团化趋势

反全球主义思潮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国际经济领域，这种影响突出表现为对多边主义的挑战。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关税战直接背弃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基本原则，拟议中的“海湖庄园协议”也将重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在美国率先放弃多边主义的前提下，其他国家能否把美国排除在外而重构一个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理论上，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一方面，美国放弃多边主义并不等于它要放弃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收益，也不会主动放弃美元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其他国家缺少集体应对的能力和动力。正在进行的关税战表明，各国陷入了经济学意义上的“集体行动难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况且，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并非全都排斥反全球主义思潮，只是对其的认知存在差异。

因而，未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方向更有可能是贸易集团化。历史上，1930年胡佛（Herbert C. Hoover）政府推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曾导致全球范围内贸易集团化的出现，如英镑区、美元区、法郎区，^[2]但未来的贸易集团化不可能是对其的简单复制。原因在于，一是美国经济与美元体系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当今美国以外的国家不会紧随其后全面推行“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三是全球价值链已成为支撑国际贸易体系的基础。鉴于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对反全球主义的认知差异以及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发展趋势（价值链的缩短与区域化或本地化），未来的贸易集团可能会是大国引领，围绕最终消费市场开展合作，推动区域内的自由贸易，并提高区域内贸易的比例。这将是多极化在经济领域的一种体现。基于上述考虑，未来可能会形成多个相互联系的贸易集团。

第一，北美贸易集团。本地区业已存在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USMCA）是联系三国经济的纽带，更重要的是，该协定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重新谈判后签署的。尽管特朗普第二任

[1] 尽管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的立场目前尚存在差异，但未来将呈现趋同之势。近来，一向对移民友好的英国工党和刚刚执政的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联合政府也都表示要限制移民。

[2] 这些货币区实际上是由于贸易战的影响，由依赖大国市场的国家所结成的货币—贸易集团。

期伊始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分别加征了一定数量的关税，但并未动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的基础。在这三个国家内部，墨西哥与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均超过70%。即便是在关税战期间，特朗普政府仍希望三个国家能进一步构建一个关税同盟，形成所谓的“北美堡垒”（Fortress North America）。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有三个：一是墨西哥和加拿大对美国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这是特朗普所不能接受的；二是特朗普致力于兼并加拿大，使之成为美国“第51个州”，受到加拿大民众的广泛抵触；三是墨西哥一直是美国非法移民的最重要通道。但总体而言，三方各自作出让步来实现“北美堡垒”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贸易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欧盟的区域内贸易比例与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都是最高的。欧盟的区域外贸易伙伴除了中国和美国外，位居前列的主要是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瑞士、俄罗斯、土耳其。一方面，面对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及全球保护主义，形成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贸易集团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另一方面，由于欧洲长期以来在安全领域依赖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有可能利用拟议中的“海湖庄园协议”对欧洲施加压力，迫使其在经济上作出让步。不过，美欧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分歧及“信任裂痕”加大，正在促使欧洲寻求建立自主安全保障机制，从而降低对美国的安全依赖。

第三，东亚贸易集团。东亚绝大多数国家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同时缺少最终消费市场。^[1]面对反全球主义思潮下保护主义的盛行，这一地区面临的压力最大。目前，该地区已存在两个相互交织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然而，由于该地区多数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对美国的双重依赖，推动构建区域贸易集团面临“集体行动难题”。中国已经开始以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目标，调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这将有助于破解该地区缺少最终消费市场的困境。同时，中国也在申请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而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在这三大贸易集团之外，很难形成其他具有独立的区域供应链体系和区域最终消费市场的贸易集团。当然，国际经济的这种贸易集团化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的。对中国而言，面对国际经济的贸易集团化趋势，需要确定相关战略定

[1] Park C. Y., “Decoupling Asia Revisited”,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506, January 2017.

位。一是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同时应当以开放的区域主义推动多边主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所说，当区域主义是封闭的，它就可能成为多边主义的绊脚石；反之，当区域主义是开放的，它就可能成为多边主义的垫脚石。^[1]二是以新发展格局为导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立于不败之地。三是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向全球经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特朗普 2.0 政策及其对全球的冲击

周琪（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特朗普于 2025 年 1 月再次登上美国总统之位，迄今已有超过半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对拜登（Joseph R. Biden Jr.）政府的内外政策弃之如敝屣，实施了大量令人震惊的新政策，不仅彻底颠覆了民主党政府以往的内外政策，给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带来了海啸般的冲击，而且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美国未来走向及其对国际社会影响的严肃思考。

（一）国内政策

特朗普政府着手对联邦政府进行大规模改造，围绕“美国优先”、加强总统权力、提高政府效率、撤销相关项目展开。

1. 改造联邦政府

（1）总统行政令继续成为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在上任的第一天，特朗普就签署了创纪录的 26 项总统行政令，撤销了前任拜登总统的 78 项行政令。与其他美国总统相比，他在当政的第一天签署了最多的行政令。^[2]这意味着，通过签署行政令治理国家仍是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他将更多地绕过立法程序，直接下达政策指令，避免在与立法机构打交道时进行政策上的讨价还价。^[3]

（2）组建政府效率部

特朗普组建政府效率部（DOGE），并任命埃隆·里夫·马斯克（Elon R.

[1] Bhagwati J., *The World Trade System at Ri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Fortinsky S., “Trump Executive Orders and Actions: By the Numbers”, January 21, 2025,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5098445-trump-executive-orders-first-day/2025-05-05>].

[3] Cabrerros I. and Bhatia A., “Trump’s Astonishing 100 Days, in 8 Charts”, April 29, 2025,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5/04/29/upshot/trump-100-days-charts.html> [2025-05-05].

Musk) 为领导人。特朗普期待,“政府效率部将为我的政府破除政府官僚主义、削减多余的监管、减少浪费性支出和重组联邦机构铺平道路”。^[1]为实现此目标,政府效率部成员被赋予了充分的信息系统控制权,以终止科学研究、气候变化倡议和多样性、公平和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DEI)项目的合同。截至2025年3月初,政府效率部通过买断任期、终止远程聘用、解雇实习期雇员等手段,裁减了逾10万名联邦雇员。但马斯克已经表示跟特朗普分道扬镳。

(3) 大幅压缩教育部规模

特朗普签署了旨在推动解散美国教育部的行政令,计划削减该部门约一半的员工。解散教育部是美国保守派长期以来的目标,但这一目标在政治上很难实现,因为这需要国会60%的得票数。美国教育部现有约4400名雇员,2024财年得到的拨款为2380亿美元,不到联邦总预算的2%。显然,特朗普更在意教育部向孩子们灌输“觉醒”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其在推行种族和性别平等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2]

2025年1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各联邦机构包括大学采取措施打击校园反犹太主义,并以冻结政府经费相要挟。4月14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冻结政府给予哈佛大学的约23亿美元多年期拨款和6000万美元多年期合同。哈佛大学以政府行为违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和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对其提起诉讼。5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撤销哈佛大学的“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计划”(SEVP)认证,禁止该校继续招收国际学生,同时要求在校的约6800名外国学生在72小时内转到其他学校,否则将失去在美国合法学习的身份。尽管国际学生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超过400亿美元,但特朗普政府强调,国家安全仍是首要考虑。5月23日,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对特朗普政府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学生的政策发出临时限制令,要求在举行听证会之前“维持现状”。^[3]

[1] Fowler S. and Bond S., “What Has DOGE Done in Trump’s First 100 Days?” April 28,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4/28/nx-s1-5377445/doge-musk-trump-100-days>[2025-05-05].

[2] Faguy A., “What Does the US Education Department Do and Can Trump Truly Dismantle It?” March 22,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79zxzj90nnod>[2025-05-05].

[3] Laviates M., Rubin L. and Berk E., “Judge Extends Order Blocking Trump Administration from Revoking Harvard’s Ability to Enroll Foreign Students”, May 30, 2025, <https://www.nbcnews.com/news/us-news/judge-extends-order-blocking-trump-administration-revoking-harvards-ab-rcna209689>[2025-05-30]; “总台记者看世界 | 哈佛大学诉特朗普政府: 学术自由的关键一战”, 2025年4月25日, <https://web.toutiao.com/article/7497134731570758178/?wid=1750903000477>[2025-05-05].

（4）取消对外援助项目

美国的对外援助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来执行的。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明确将美国对外援助项目冻结90天以进行逐项审查，并且通过强制休假和解雇使大多数国际开发署工作人员离职。特朗普政府表示，将取消国际开发署6200个多年期合同中的5800个，削减金额540亿美元，而且国际开发署将重新并入国务院。特朗普表示，海外支出必须与其“美国优先”方针密切关联，国务卿马尔科·安东尼奥·鲁比奥（Marco A. Rubio）则坚称，该机构的支出必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每一美元”都必须有证据证明它使美国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1]

（5）冻结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一个主要通过美国国务院来获得美国国会拨款的机构，它号称支持全世界2000个致力于维护“人权、新闻自由、法治和民主”的组织。^[2]如今，特朗普政府拒绝支付NED先前获得国会批准的近2.4亿美元资金，并因此受到该机构的起诉。2025年3月14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缩减美国国际媒体署（USAGM）的业务到法规规定的最低限度。由美国政府运营的“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将被关闭。特朗普的态度再一次表明，他对在海外促进“人权和民主”不感兴趣。^[3]

2. 打击非法移民

加强边境执法和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两项主要承诺。其措施包括：宣布非法移民问题构成国家紧急状况，动用军队、联邦机构以及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利用国家机构数据库来发现非法移民，并通过削减一系列福利和服务迫使移民离开美国。其目标是每年驱逐100万名非法移民。截至2025年4月29日，特朗普政府共采取了181项针对移民的行政行动；截至2025年4月

[1] Knickmeyer E., Lee M. and Sherman M., “Trump Administration Says It’s Cutting 90% of USAID Foreign Aid Contracts”, February 27,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usaid-foreign-aid-cuts-6292f48f8d4025bed0bf5c3e9d623c16>[2025-05-05]; Seddon S., “What Is USAID and Why Is Trump Poised to ‘Close It Down’?” February 8, 2025,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lyezjwnx5ko>[2025-05-05].

[2] Kurlantzick J., “Democracy Promotion like the NED Already Hit Asian Organizations Hard”, March 3, 2025, <https://www.cfr.org/blog/trumps-cuts-democracy-promotion-ned-already-hit-asian-organizations-hard>[2025-05-05].

[3] Langfitt F., “Democracy-promoting Organization Su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over Withheld Funds”, March 6, 2025, <https://www.npr.org/2025/03/06/nx-s1-5320021/national-endowment-democracy-sues-trump-administration-withheld-funds>[2025-05-05].

23日，通过“抓捕并吊销”（Catch and Revoke）计划取消了270多所高校约1700名学生的签证或移民记录。美国政府还提出要限制出生公民权、暂停难民安置，以及对绿卡持有者、国际学生和有意移民者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在美国政府对2026年的预算建议中，为国土安全部拨款438亿美元，以“全面实施总统的驱逐非法移民政策”，并完成美国西南边境墙的建设以及其他措施。^[1]在特朗普执政的前100天，这些举动已遭受至少50起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和各州民主党籍总检察长等提起的诉讼。^[2]

3. 大幅度减税

特朗普政府国内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减税，这体现在美国参众两院最近通过的立法上。2025年的预算法案规定，未来10年内将削减4.5万亿美元税收和2万亿美元支出，同时将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提高至4万亿美元。拟削减经费的近半数（约8800亿美元）来自医疗补助计划、食品券以及教育经费等项目。^[3]

4. 结束绿色新政

特朗普政府鼓励化石能源开采，并将液化天然气作为其能源政策的支柱。特朗普政府宣布进入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指示联邦机构消除有碍于能源基础设施项目批准的所有障碍，并于2025年2月14日成立了“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以协调增加能源生产的政策，同时消除“不必要的”监管。特朗普政府继续忽视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撤销了30多项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规；取消了对使用电动汽车的强制令，以促进美国的汽车工业发展和工人就业。^[4]

（二）对外政策

特朗普再次上任后，在外贸和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政策。

1. 发动关税战

与国内减税政策相对应，特朗普政府大幅度提高关税，通过关税所得来弥补

[1] Pike L. and Iyengar R., “What Trump’s New Budget Says about U.S. Foreign Policy”, May 2, 202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5/02/trump-white-house-2026-budget-state-department-defense/>[2025-05-05].

[2] Chishti M. and Bush J. K., “In First 100 Days, Trump 2.0 Has Dramatically Reshaped the U.S. Immigration System, But Is Not Meeting Mass Deportation Aims”, <https://www.migrationpolicy.org/article/trump-2-immigration-first-100-days>[2025-05-06].

[3] “特朗普最后一刻用电话攻破共和党人，为4.5万亿减税计划铺路”，2025年2月26日，<https://finance.ifeng.com/c/8hHgNdgtJj>[2025-05-06].

[4]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s, Unleashing American Energy”,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unleashing-american-energy/>[2025-05-06]; Cohen A., “How LNG Exports Will Define U.S. Energy Policy under Trump 2.0”, February 27, 2025, <https://www.forbes.com/sites/arielcohen/2025/02/27/how-lng-exports-will-define-us-energy-policy-under-trump-20/>[2025-05-06].

因国内减税政策而减少的政府税收。

特朗普于2025年2月1日签署行政令，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对来自加拿大的能源资源征收10%的关税。^[1]2025年2月10日，特朗普下达行政令，宣布对所有出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2025年4月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提高美国的竞争优势，保护美国主权，并加强美国国家和经济安全，为此，将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同日，宣布对全球多个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引人注目的是，4月30日，美国参议院以50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动议，暂时搁置阻止特朗普政府对全球多国征收关税的表决要求。^[2]2025年5月28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超越了该法授予总统的权力，为此判决特朗普政府实施对等关税违法，并永久禁止实施。^[3]第二天，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决，在该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期间，暂时中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出的判决和永久性禁令。^[4]

2. 觊觎他国领土和资源

一是加拿大。特朗普曾多次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加拿大应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并认为这是解决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贸易问题的“唯一途径”。^[5]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加拿大官方及民众的强烈反对，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 (Mark Carney) 斥责其为“对主权的威胁”。

二是格陵兰岛。特朗普政府已在正式推进从丹麦手中夺得格陵兰岛的计划。“格陵兰岛属于美国”已经从特朗普的言论变为美国的官方政策，特朗普甚至不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2025年2月2日，<https://news.cctv.cn/2025/02/02/ARTIX2svtLs6Fc2emHtRJUNJ250202.shtml>[2025-05-06]。

[2] “阻止特朗普滥征关税的议案被搁置”，2025年5月2日，<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5-05-02/doc-inevekkw4834753.shtml>[2025-05-06]。

[3]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ermanently Enjoins President Trump’s ‘Reciprocal’ Tariffs”，May 29, 2025, <https://www.bipc.com/u.s.-court-of-international-trade-permanently-enjoins-president-trump%E2%80%99s%E2%80%9CReciprocal%E2%80%9D-tariffs>[2025-05-30]。

[4] Knauth D. and Marsh S., “Trump’s Tariffs to Remain in Effect after Appeals Court Grants Stay”，May 29, 2025,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us-ruling-that-trump-tariffs-are-unlawful-stirs-relief-uncertainty-2025-05-29/>[2025-05-30]。

[5] Schneid R., “Ahead of Canada’s Election,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Speaks out on Trump’s Plans to Annex the Country”，April 27, 2025, <https://time.com/7280793/does-trump-plan-to-annex-canada-marco-rubio-51st-state-comments/>[2025-05-06]。

借以武力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多次召开会议，将特朗普的言论付诸行动，还向政府的多个部门发出了具体指示。^[1]

三是巴拿马运河。特朗普在其就职典礼上宣布，将采取措施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理由是美国“被过度收费，没有得到公平对待”。2025年5月初，在美国的压力下，巴拿马与美国达成协议，允许美国在巴拿马部署军事人员，并使用巴拿马控制的设施进行训练、演习和“其他活动”。^[2]

四是加沙。2025年2月9日，特朗普公开表示，他反对巴勒斯坦人和加沙地带的其他居民返回加沙。特朗普将加沙比喻为一个“大型房地产地块”，是一个需要被“夷平”和“修复”的“拆迁现场”，声称他有意“购买和拥有加沙”，并建议其他中东国家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安置地。对此，联合国警告称，根据国际法，严格禁止任何强迫平民离开被占领土的行为。^[3]

五是乌克兰。2025年2月13日，美国要求乌克兰偿还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给予它的援助，金额为3000亿美元。特朗普表示，这笔钱不是无偿援助，而是借款。随后特朗普政府同意将这笔款项下调至约1000亿美元。^[4]但4月30日，在美国的胁迫下，美国和乌克兰签署了《美乌重建投资基金成立协议》。该协议要求，乌克兰将新开采的稀土等矿产资源收益的50%注入美乌联合基金，美国则以资金、技术和军事援助入股，未来美国可以在竞争条件下购买这些矿产资源。美国专家指出：“该协议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将矿产纳入其外交政策。”^[5]

3. 收缩美国的国际责任

第一，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美国再次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等国际机构和条约。他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处理新冠疫情时存在失误，且对中国有偏袒之嫌。至于《巴黎协定》，特朗普认为它对美国不公平，给美国经济带

[1] Crowley M. and Haberman M., “Inside Trump’s Plan to ‘Get’ Greenland: Persuasion, Not Invasion”, April 10,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4/10/us/politics/trump-greenland-denmark.html>[2025-05-06].

[2] “US to Deploy Troops along Panama Canal under New Deal”, April 11, 2025,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50411-panama-deal-allows-us-to-deploy-troops-to-canal>[2025-05-06].

[3] Shabad R., “Trump Says Palestinians Wouldn’t Be Allowed Back into Gaza under His Plan”,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donald-trump/trump-says-palestinians-wouldnt-allowed-back-gaza-plan-rcna191491>[2025-05-30].

[4] “美媒：美改口称累计援乌1000亿，不是3000亿”，2025年4月16日，<https://web.toutiao.com/article/7493861451497554442/>[2025-05-07].

[5] Baskaran G. and Schwartz M., “What to Know about the Signed U.S.-Ukraine Minerals Deal”, May 1,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at-know-about-signed-us-ukraine-minerals-deal>[2025-05-07].

来了压力，特别是在减排目标方面。他强调，美国应优先捍卫国内经济利益，而非屈从于国际社会的规范。

第二，特朗普正在对美国国务院实施自1789年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机构重组。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以及全球妇女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等132个机构面临预算削减或直接裁撤的前景，10个大使馆和17个领事馆将被关闭，这些大使馆中的大多数位于非洲，领事馆中的大多数则位于欧洲，国务院非洲事务局也将被撤销。

第三，特朗普政府的2026年预算建议显示，特朗普想要大幅度减少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该预算计划削减1630亿美元的非国防开支，比2025年的水平低22.6%。削减幅度最大的是国务院和其他国际项目，高达83.9%（491亿美元），包括削减用于“发展、民主和经济援助”的83.3亿美元资金。特朗普政府称这些资金“流向了激进的左翼优先事项，包括气候变化，多样性、公平和包容，以及世界各地的LGBTQ^[1]活动”，还将削减用于全球环境基金和气候投资的2.75亿美元资金。^[2]

4. 继续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

第一，特朗普延续其第一任期对中国的政策，仍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为了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特朗普政府将对华贸易战扩大到极限。美国对国防部和商务部增加预算，主要是为了在军事上抗衡和在经济上压制中国：国防开支将增加13%，达到1130亿美元，重点是发展美国造船业、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国，以及建立一个被称为“金穹”（Golden Dome）的导弹防御系统；对商务部增加了1.34亿美元的预算，用来维护主要针对中国的所谓“公平贸易”，其中包括为反倾销调查提供新的资金，以及将工业和安全局（BIS）的资金增加50%，达到1.22亿美元，旨在维护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竞争力。^[3]

第二，在特朗普签署的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各项行政令中，中国是最大的目标。从2025年2月1日起，美国以“芬太尼泛滥”“国家紧急经济状态”“对等

[1] LGBTQ是多元性别与性取向群体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分别代表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以及酷儿或对性别自我存疑的个人与群体（Queer/Questioning）。

[2] Pike L. and Iyengar R., “What Trump’s New Budget Says about U.S. Foreign Policy”, May 2, 202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5/02/trump-white-house-2026-budget-state-department-defense/\[2025-05-07\]](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5/02/trump-white-house-2026-budget-state-department-defense/[2025-05-07]).

[3] Pike L. and Iyengar R., “What Trump’s New Budget Says about U.S. Foreign Policy”, May 2, 202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5/02/trump-white-house-2026-budget-state-department-defense/\[2025-05-07\]](https://foreignpolicy.com/2025/05/02/trump-white-house-2026-budget-state-department-defense/[2025-05-07]).

关税”为由，对中国加征了多轮关税，税率合计达到145%，个别中国产品甚至面临最高达245%的关税。在经过中国的坚定反制后，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共计91%的加征关税，暂停实施24%的“对等关税”。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还在进行中。此外，4月7日的总统行政令要求于5月2日终止从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寄往美国的价格800美元以内的小额包裹免税政策；4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一项计划，在180天后，对所有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船只（包括中国建造和拥有的船只）征收额外费用。

第三，特朗普政府将更多的中国公司和组织纳入“实体清单”，进一步收紧对中国芯片禁运措施。特朗普于2025年2月21日签署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规定，限制有中资背景的人投资于美国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医疗、农业、能源、原材料或其他战略领域；把美国对华投资限制的行业范围扩大到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高超音速技术、航空航天、先进制造、定向能等高科技领域。

（三）对全球的冲击

特朗普政府迄今展示的对外政策搅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所有国家都对此感到震惊和不安。目前，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的效果还远未显露，中美之间的贸易僵局尚未打破，其他国家在屈从还是力争两者之间举棋不定。在这种情况下，预测美国未来的走向，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随着美国逐步解构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亲手构建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美国乃至世界将发生难以估量的变化。

第一，美国不断指责中国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特朗普的行为恰恰表明是美国而非中国在这样做。美国处理国际事务时，将美国法律置于国际法之上，所谓“毒品管控不严”“国家紧急状态”都可作为不遵守国际规则而强加关税的理由。如果其他国家也采取类似做法，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何在？

第二，格陵兰岛原在丹麦政府的管辖之下，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层融化，其经济和战略价值上升，这引发了特朗普的觊觎；加拿大是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主权国家，特朗普竟异想天开地想将其兼并；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人享有合法居住权利的土地，特朗普却要剥夺其权利，打算将加沙地带作为“房地产地块”来开发；关于巴拿马运河，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把美国的行为斥责为“仅仅因为美国有能力就剥夺其他国家的

资产”。^[1]凭借自身的实力，强行攫取所觊觎之物，这种做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被国际社会摒弃的强权政治有何区别？

第三，美国的盟国尤其是欧洲国家都要重新认识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无论是挥舞关税大棒，或是美国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谈判中完全绕开欧洲，抑或退出有关气候变化、卫生的国际组织，都给了欧洲“当头一棒”。如果说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已经使欧美之间产生了嫌隙，那么特朗普的第二任期更使欧洲看清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实质和可能造成的危害，对美国的战略信任进一步下降。随着美国加征关税，欧盟将加强与其他全球贸易伙伴的关系，并寻求其全球关系的多样化。尽管欧洲还在尽可能挽救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将会对其贸易关系进行重大调整，全球贸易格局很可能随之发生变化。这种新的世界贸易秩序可能将长期影响地缘政治关系。^[2]

受特朗普第二任期影响最大的政策领域之一是跨大西洋安全关系。特朗普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质疑曾造成该组织内部产生裂痕，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James D. Vance）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公开抨击欧洲在“基本价值观”上发生倒退，使得那些在防务战略上严重依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的欧洲领导人感到十分震惊。欧洲仍面临重新评估其安全政策和是否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以实现防务自主的选择。

第四，过去七八十年，美国一直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如今特朗普政府的表现，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领导地位的可靠性。特朗普声称，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在利用美国，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美国成了受害者。许多国家担心，如果继续沿着特朗普政府的现行路线走下去，美国不仅不会再度伟大，还会导致其影响力、合法性和权力无可挽回地减弱。^[3]

第五，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1960年提出的“特里芬悖论”，作为主权货币，美元需维持币值稳定（这要求美国保持贸易顺差）；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需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这要求美国持续输出

[1] Hughes A. S., “Why the Panama Canal Is on President Trump’ s Agenda”, March 11, 2025, <https://www.hks.harvard.edu/faculty-research/policy-top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security/why-panama-canal-president-trumps>[2025-05-07].

[2] Rasmussen M. J., “Global Implications of the First 100 Days of Trump 2.0 for Europe”, April 28, 2025, <https://apcoworldwide.com/blog/global-implications-of-the-first-100-days-of-trump-2-0-for-europe/>[2025-05-07].

[3] Malangmei P., “The Paradox of Trump 2.0”, April 13, 2025, <https://www.e-ir.info/2025/04/13/the-paradox-of-trump-2-0/>[2025-05-07].

美元，这又会导致贸易逆差)。若美国纠正贸易逆差，全球将面临流动性短缺。特朗普现在要强行打破现有平衡，不仅要美元霸权，还要贸易顺差。特朗普要通过向其他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弥补美国过去所遭受的“损失”，但即便特朗普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现有的36万亿美元国债又由谁来认领？如果美国的决策者坚持追求两者兼得，那不仅会扰乱全球商业和金融市场，增加美国和世界各地物价上涨和经济衰退的风险，还会导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混乱。

第六，认为美国之所以变得如此不可理喻，仅仅是因为特朗普执政，那只能是一种幻想。特朗普正是当今极化的美国政治孕育出来的领导人，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迎合了美国国内大量右翼民粹主义者的要求。美国政治家因中国快速成长而产生的危机感，正反映了他们实际上已承认美国自身实力相对下降的事实，对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被他们当作夺回竞争优势的手段。这样的美国与冷战结束之初自信的美国已不可同日而语。特朗普第二任期给美国带来的深刻变化及其引起的全球变化，也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民粹主义崛起冲击国际合作体系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近年来，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势力快速兴起。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在西方国家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民粹主义政治家通常以强调平民大众的价值观念、反对精英统治的政治立场示人。民粹主义政治家往往倾向于提出简单化的政治口号，以吸引广大民众的支持；善于激发民众的不满情绪，并动员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民粹主义政治家已在多个国家当选并执掌政权。民粹主义执政者实行的政策对国内国际体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国际经济格局带来了多维度冲击，其影响既体现在短期政策的调整上，也深刻改变了长期国际合作逻辑。通过分析美欧民粹主义崛起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把握未来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一）美欧民粹主义兴起的表现及成因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快速兴起，既包括左翼民粹主义，也包括以民族主义和反经济全球化为特点的右翼民粹主义。2014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2017年，“政治素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2025年再度就任美国总统。2016年，英国通过全民公投作出了“脱欧”的决定。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已有一些欧洲国家由民粹主义政党单独执政或参与执

政联盟。^[1]

民粹主义，之前常常被认为带有“草根”色彩。然而，在新近一波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中，中产阶级占据较大比重，其民众基础更为广泛。^[2]民粹主义在政治上呈现出对抗姿态，形式上常常带有强烈的反精英、反建制特征。未执政时，民粹主义者的政治理念与活动围绕反对现有制度和精英展开；执政后，其政治宣传和政策仍具有对抗性，目的是为“人民”树立新敌以稳固权力。^[3]

美欧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共同的背景是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不平等加剧。而民粹主义将这一切皆归因于经济全球化。首先，企业投资的转移及技术进步导致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下滑，他们对当前状况感到不满，这便为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其次，移民问题引发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危机，社会撕裂加剧，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和体制失去信任，民粹主义势力趁机崛起。最后，传统政党未能有效回应民众诉求，政治极化加剧，民粹主义势力作为对现有体制的反抗力量出现，迅速获得民众的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构建的一套国际合作体系遭到民粹主义势力诟病并成为其攻击的对象。民粹主义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产业转移和失业问题，使得发达国家部分民众的利益受损。民粹主义势力成为主张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民粹主义势力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很敏感，尤其是，新兴国家崛起挑战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在部分发达国家民众中引发不安和焦虑，而民粹主义势力便利用这种情绪来赢得民众的支持。

（二）民粹主义对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及跨境投资形成巨大冲击

美欧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不仅颠覆了传统政治生态，而且通过政策转向与价值重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多边经济体系带来多维冲击。其反全球化、反建制、反精英的核心诉求，正从影响短期政策转向带来长期的制度性变革，推动国际经济格局进入深度调整期。

民粹主义势力执政推动关税壁垒与非关税措施的双重升级。民粹主义政府以“经济主权”叙事为工具，系统性瓦解全球贸易规则。在美欧国家，民粹主义势力执政后，倾向于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权

[1] 戴长征：“欧美新近一波民粹主义的成因、特点及影响”，《人民论坛》，2020年第32期。

[2] 林红：“当代民粹主义的两极化趋势及其制度根源”，《国际政治研究》，2017年第1期。

[3] 戴长征：“欧美新近一波民粹主义的成因、特点及影响”，《人民论坛》，2020年第32期。

威。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通过“301条款”将对华关税覆盖范围从传统制造业扩大至高科技产品。美国的政策转向还导致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随着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中占据优势，其对欧盟委员会施加的压力也随之增大。欧盟委员会设计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通过构建“绿色壁垒”将气候政策嵌入贸易规则。2023年全球贸易限制措施存量较2016年激增3倍，其中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占比显著上升。民粹主义带来的更深远影响是区域贸易协定加速替代多边框架。随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陷入瘫痪，各国开始倾向于通过双边或多边小团体协议来解决贸易问题，导致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陷入停滞。例如，《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通过“毒丸条款”阻挠中国与他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的谈判则聚焦“价值观准入”议题。

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势力推动“经济安全”叙事，将全球供应链问题“政治化”，导致关键产业（如芯片）的贸易被嵌入地缘政治竞争中，进而使得全球分工效率下降。民粹主义势力推动的“经济安全”叙事，还导致关键产业供应链呈现“武器化”趋势。自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大行其道，国会立法也受到民粹主义较大影响。这一趋势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了延续。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批准了520亿美元的补贴，旨在构建本土半导体产业链，同时对相关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活动施加了限制。2024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净零工业法》，将电池、氢能等绿色技术产业纳入战略保护范围，也就是，可采用关税及非关税的办法来保护这些产业，防止外国产品更多进入欧洲市场。这种“产业政策内卷”不仅推高全球生产成本，而且导致技术封锁与标准的割裂。据波士顿咨询集团测算，如果在每个地区拥有完全自给自足的本地供应链，半导体价格总体可能上涨35%~65%。^[1]

随着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跨境投资也呈明显下降趋势。欧美国通过强化外资审查，将投资政策嵌入地缘政治博弈。美国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将审查范围扩展至关键技术的非控股投资，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筛查机制则要求成员国共享敏感领域的投资信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这种政策转向导致全球跨境并购在2022年同比下降23%。其中，由于欧盟加强了审查中国对欧洲投资的力度，2022年中国对欧

[1] “波士顿咨询：在不确定的时代加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报告”，2022年12月26日，<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2-12-26/doc-imxxxyti1241818.shtml>[2025-04-25]。

洲的投资额较2021年下降了22%。^[1]

民粹主义势力主张“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制造业回归”。然而，这种完全无视市场机制的政策很快便暴露出成本高昂的问题。以美国为例，《芯片与科学法》为外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提供了巨额补贴。虽然此举成功吸引了台积电、三星等企业赴美建厂，但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供应链的断裂以及能源价格的上涨，导致这些项目面临延期和成本超支的问题。据行业分析，美国的半导体生产成本比东亚地区高出约30%，而且缺乏完整的产业链配套。^[2]这种依赖补贴的产业政策不仅扭曲了资源配置，还可能触发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补贴竞赛，进而导致更多的市场扭曲。

（三）民粹主义对世界经济增长及国际发展格局重构产生巨大影响

民粹主义势力推动的逆全球化趋势，正对全球的长期增长潜力造成结构性损害。贸易碎片化与供应链重组系统性削弱全球增长动能。世界银行预测，如果全球贸易碎片化持续，203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损失可能达1.4万亿~7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损失的占比可能超过60%。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损失具有长期性。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也将面临通胀上升与技术扩散减缓的双重挑战。民粹主义政府制定的政策通过提高生产成本与抑制技术流动，引发经济困境。例如，美联储研究表明，2018—2021年对华征收关税使得美国的通胀率累计上升了0.5个百分点。美国对华征收关税推高消费品价格，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中关税贡献率约1.3个百分点。^[3]一些国家实行科技民族主义政策，导致全球专利申请合作网络密度下降12%，^[4]阻碍跨国技术转移，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种“通胀—效率”双重损失的格局，使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与高成本的恶性循环。

民粹主义在发达国家的崛起，也使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上升。民粹主义政府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风险溢价要求提高。由于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从发达经济体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成本溢价上升。新兴经济体

[1] “中国对欧投资降至十年最低点：未来何去何从？”2023年5月23日，[https://news.qq.com/rain/a/20230523A0143N00?suid=&media_id=\[2025-05-16\]](https://news.qq.com/rain/a/20230523A0143N00?suid=&media_id=[2025-05-16])。

[2] “台积电美国厂良率超台湾工厂，但成本高出30%！究竟因何而然？”2024年12月31日，[https://www.sohu.com/a/843613905_122001005\[2025-05-16\]](https://www.sohu.com/a/843613905_122001005[2025-05-16])。

[3] “专访：美取消对华加征关税将有助于降低通胀和稳定预期——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2022年5月4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p/240361.html\[2025-05-16\]](https://www.yidaiyilu.gov.cn/p/240361.html[2025-05-16])。

[4]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

面临资金外流与产业空心化等较多风险。2023年，发展中国家的FDI占比降至历史低点。

美国和欧洲国家将发展援助深度捆绑“民主标准”，削弱了传统南北合作的中立性。例如，欧盟“全球门户计划”将60%的资金投向所谓的“民主国家”，美国“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3W）明确排除“非民主国家”。这种政策转向导致发展援助的政治化程度显著上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2022年战略导向型援助的占比上升至45%，而用于减贫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则相应减少。

民粹主义政府在气候议题上的摇摆加剧全球气候融资缺口。美国在气候政策上反复无常，如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第二任期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削弱了国际社会的信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全球气候资金缺口已扩大至每年2.5万亿美元。

（四）民粹主义对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民粹主义势力在欧美国家上台后，对过去数十年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欧盟曾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典范，然而在民粹主义冲击下，其步伐也变得艰难。

欧盟的单一货币与共同市场设计最初旨在通过规模效应提升竞争力，然而在实践中，南北欧国家在产业优势、债务负担上的差异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高福利政策与负债运营模式使得德国等经济强国需补贴经济疲软的其他欧洲国家，民粹主义势力借此将“牺牲国家利益”标签化，进而煽动民众对欧盟精英的敌视。2015年“难民潮”引发的社会撕裂，成为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催化剂。英国“脱欧公投”中，“夺回控制权”的口号实质上反映了民众对劳动力市场竞争与文化同质性遭受损害的担忧。欧洲的极右翼政党，例如法国国民联盟，通过将移民问题与法国的经济困境联系起来，成功地将局部问题转变为反对欧洲一体化的全民共识。

随着民粹主义势力开始影响本国及欧盟的政治舞台，欧洲一体化的经济政策面临新的挑战。为应对民粹主义带来的压力，欧盟需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安抚弱势国家，但此举加剧德国和法国等国家选民的不满情绪。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提出的“联合防卫基金计划”虽然旨在增强凝聚力，却因成员国在分摊成本上存在争议而被搁置。欧盟似乎陷入了“不改革则面临解体，改革则可能导致加速分裂”的恶性循环。

在德国选择党和法国国民联盟等疑欧政党的推动下，反对共同债务的呼声高涨，导致单一市场的进一步深化遭遇阻碍。在2023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提出了“退出欧元区”的主张，这给欧洲共同债务工具的推进带来了阻碍。原本计划推迟的“下一代欧盟复苏基金”由于内部谈判破裂，部分国家被迫转向主权债券市场筹集资金，进而抬高了债务成本。

民粹主义在欧盟成员国兴起，各国纷纷尝试通过产业政策推进自身的“再工业化”议程，这不仅破坏了欧盟的规则，还损害了效率，并引发更多的内部摩擦。例如，南欧与北欧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南欧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占比远未达到欧盟均值，这样的差距使得欧盟很难形成统一的人工智能发展政策。民粹主义政党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强调“技术主权”，推动本土保护政策，拒绝适用欧盟统一技术标准。欧盟成员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各自为政，削弱了欧盟整体竞争力。

欧盟成员国在能源转型上本就持有不同观点，而民粹主义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立场的分歧，使得欧盟在协调能源转型政策上面临重重困难。例如，2024年德国执政联盟迫于民粹主义势力的压力而提前关闭核电站，转而依赖天然气。然而，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德国还可从俄罗斯进口廉价的天然气，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国被迫削减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数量，增加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导致成本急剧上升。同时，德国在许多事务上不得不依赖美国的决策。法国则坚持发展核电，其核电站发电占比约70%。^[1]一些东欧国家直接抵制风电设施的扩建，如波兰农民提出“扩建破坏景观”，使得波兰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一再搁浅。匈牙利政府长期排斥欧盟绿色补贴，转而与俄罗斯合作开发传统能源项目，同时通过“家庭补贴”政策将工业投资引向低效的本土企业，使得匈牙利在欧盟新能源产业链中被边缘化，2024年其光伏产能仅为波兰的1/3。由此可见，欧盟各成员国能源战略差异显著，欧盟“绿色新政”目标因内部博弈而难以协同推进。

外来移民是引发欧洲民粹主义浪潮的关键因素，也加剧了欧洲产业链的冲突。例如，2023年，随着西班牙中右翼政党Vox上台，西班牙政府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制造业，然而，这些措施的前提是“保护本土就业”。基于此，西班牙决定对进口汽车（如德国的汽车）加征15%的关税，并对摩洛哥移民劳工流入农业部门进行限制。此举虽获得底层选民的支持，却破坏了欧盟单一市场原

[1] 尚凯元、王林：“法国能源转型‘以核为贵’”，《中国能源报》，2023年12月25日，第11版。

则，导致欧盟成员国在供应链重组中陷入“零和博弈”。

欧盟曾是世界各国效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范，其成功经验被广泛借鉴。目前欧盟所面临的一体化困境，在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尝试中也有所体现。

亚洲曾是借鉴欧洲一体化经验的模范生，但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也遭遇重重阻碍。例如，RCEP谈判是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谈判，如果印度加入，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然而，印度担心加入RCEP后，中国和东盟的制造业产品将冲击其纺织、汽车零部件等本土产业，国内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可能面临失业风险。为了巩固选民基础，印度政府决定退出RCEP谈判，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开放市场。印度错失融入亚太最大自由贸易区的机会，其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制造业升级进程陷入停滞。

印度尼西亚是东盟第一大国，原本为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支持者。然而，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印度尼西亚政府实行“资源民族主义”，自2014年起逐步禁止镍矿出口，要求外资企业在本地建设冶炼厂以提升附加值。此举表面上旨在促进就业增长和产业升级，却引发了质疑，人们认为这是为了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限制初级资源出口来转移矛盾。此外，印度尼西亚的“示范”效应促使菲律宾等国家也采取了限制矿产出口的措施，导致全球镍价波动风险上升。

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国家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进展，设计了较多经济一体化方案。但是，近年来随着民粹主义的发展，非洲的经济一体化也遭遇较多阻碍。2012年1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第18届首脑会议上，非洲联盟批准了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决定和促进非洲内部贸易的行动计划，将其作为促进非洲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举措。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直至2022年，非洲各国在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方面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部分非洲国家的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关税，故拒绝履行相关承诺。此外，由相关势力推动的贸易保护主义与资源民族主义削弱了区域价值链的整合。一些非洲国家开始以“民族主义”的名义限制矿产出口，造成供应链断裂。此类政策虽短期内转移了国内矛盾，但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也会削弱区域投资环境的稳定性。

在拉丁美洲，阿根廷政府在退出与重返南方共同市场的决策上表现得反复无常，使得拉丁美洲的供应链稳定性受到损害。尤其是，阿根廷政府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之后多次暂停关税优惠，导致巴西等国家对阿根廷的出口数额下降。此外，民粹主义浪潮也使得这个区域的产业政策出现“内

卷”现象。例如，阿根廷通过“黄金权力”机制限制外资并购，但未能通过这种措施有效扶持本土企业，制造业占比不增反降。

（五）结论

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运动已从政治变量转化为系统性经济风险，其核心在于用“相对收益”思维替代国际合作中的“绝对收益”逻辑。未来十年，全球经济可能进入“低效率均衡”：增长放缓（年均3%以下）、通胀波动（3%~5%常态）、投资回报率下降。应对这一趋势需要重构国际合作底线规则，例如，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治等领域建立“最小公约数”机制，但短期内难见突破性进展。

民粹主义并非简单的“逆流”，而是全球经济发展阶段性矛盾的集中反映。其带来的冲击将持续考验国际经济体系的韧性，倒逼各国在开放与安全、效率与公平间探索新路径。唯有以制度创新回应治理赤字，方能在变局中重塑增长动力，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积极建设者。在民粹主义崛起的时代，许多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国际惯例遭受质疑，一些曾经参与制定这些规则的国家开始对其不屑一顾。基于此，中国必须更加认真地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运动，有针对性地设计未来的国际制度，同时以周边国家为基础，重新打造并巩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此外，还需警惕民粹主义对金砖国家成员的影响，从而避免破坏既有的国际合作架构。

右翼浪潮冲击欧洲稳定和雄心

张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近年来，右翼思潮在欧洲各国迅速蔓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右翼势力都处于上升态势。最近几年的欧洲选举，无论是全欧层面的欧洲议会选举，还是成员国层面、地区层面的选举，都凸显了这一发展趋势。在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右翼势力的浪潮愈发高涨。欧洲右翼的崛起，其原因复杂多样，非法移民问题、难民问题，以及中间政党趋同化、平庸化，加之经济形势不佳、社会贫富分化、族群问题突出等，都促成了右翼思潮和势力的发展壮大。鉴于促成右翼浪潮的因素仍然存在，且未来极可能恶化，可以预料，右翼势力将继续发展，未来十年有可能在全欧洲范围内超越传统的中右翼主流政党。事实上，在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等国家，极右政党已经成为第一大政党。目前来看，右

翼浪潮已经严重冲击欧洲的稳定和雄心，未来这种冲击可能会更加剧烈。

（一）加剧欧洲发展困境

过去十余年，欧洲国家普遍遭遇发展困境，如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分化，这为右翼势力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右翼势力的兴起和扩张将使欧洲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多挑战，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恶性循环。

1. 政局不稳定性上升，动荡趋势显现

过去中左、中右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一去不返，右翼势力持续发展壮大，多个国家议会内部政党林立，三党、四党甚至更多党派联合执政的情况已成为常态。更严重的是，频繁的政府倒台、提前选举、政府内斗、决策困难也已成为常态。

2024年法国提前举行议会大选，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得票率上升，其在议会的议席也从上一届的89席增至142席。法国随后陷入政治危机，难以组阁施政，一年内三次更换总理。巴尼耶（Michel Barnier）政府任期更是不足三个月，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届政府。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失去了对议会的控制权和对国内改革议程的主导权。德国向来被认为是欧洲政治的“稳定锚”，但随着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崛起，德国政治也开始陷入不稳定状态。2021年德国首次组成三党联合政府，之后内斗不断，联合政府于2024年11月解体。2025年2月23日德国提前进行大选，选择党继续壮大，获得近21%的选票，进一步压缩了所谓主流政党的空间。如果德国新政府无法带领德国走出困境，右翼势力还可能继续发展壮大。2025年4月8日，黑红联盟政府公布联合执政协议，而同一天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选择党的支持率高达25%，超过了联盟党24%的支持率，跃居第一。^[1]

2. 经济发展受限，难以摆脱低迷的困境

这几年，特别是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经济遭遇巨大冲击，陷入滞胀的泥潭，特别是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火车头，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负增长，高通胀、高房租等带来的“生活成本危机”^[2]持续蔓延，这也是右翼

[1] “Germany’s Far-right AfD Tops Poll for First Time in Blow to Chancellor-in-Waiting Merz”, April 9,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germanys-far-right-afd-tops-poll-first-time-blow-chancellor-in-waiting-merz-2025-04-09/>[2025-05-21].

[2] 生活成本危机主要指家庭每天基本生活支出如食品费用、电费、燃气费，上涨过快，大大超过收入增长速度。Pieper O., “Germans Fear Rising Cost of Living”, October 9, 2024, <https://www.dw.com/en/germans-fear-rising-cost-of-living/a-70444023>[2025-05-21].

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右翼势力的兴起将使欧洲在经济上更为困难。一方面，欧洲经济要走出泥潭，需要进行深入的结构性改革，包括针对福利体系以及就业、教育体系等方面的改革，这需要形成较高的政治共识。然而，由于议会及政府内部存在碎片化的情况，各党派很难形成共识，从而难以推进必要的改革。比如法国，2024年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5.8%，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113%，^[1]而且仍在快速增长。这构成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需要大幅削减养老金等各种社会支出。2024年，法国政府提出的2025年预算案中包含了削减开支的目标，但这一提案遭到了议会的反对。由于未能获得信任投票，巴尼耶最终选择了辞职。新上台的贝鲁（François Bayrou）政府之所以能够继续执政，是因为它放弃了巴尼耶政府的多项改革目标。然而，如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持续无节制地增加，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右翼的理念在经济领域本质上倾向于民粹主义，即主张增加福利、减税等，但这又无法不增加财政赤字。例如，法国的国民联盟主张，将退休年龄从64岁降至60岁，大幅削减企业税，取消30岁以下青年人的个人所得税，这些措施的实施预计将每年额外增加支出121亿欧元。^[2]国民联盟的立场在诸多方面与左翼的立场相似，进而形成了强大的反改革、反市场力量，大大制约了政府的行动力，导致在经济体制上积弊难改。

3. 社会激进化和极端化，族群矛盾加大

总体而言，欧洲社会近年来更趋激进和极端，带有政治性质的暴力事件甚至恐怖主义事件频频发生。2024年5月15日，被欧洲主流政党视为民粹主义政客的斯洛伐克总理罗贝尔特·菲佐（Robert Fico）遭遇枪击，一度生命垂危。这是20年来首次发生欧洲领导人遇刺，反映欧洲社会和政治氛围日益紧张。2024年6月7日，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在首都哥本哈根遭到一名男子殴打并受伤。2023年6月27日，法国一名17岁的北非裔少年因遭警察枪击而身亡，引发法国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出现大规模打砸

[1] Katanich D., "French Deficit Came in Lower than Expected in 2024 but Risks Remain", March 27, 2025, <https://www.euronews.com/business/2025/03/27/french-deficit-came-in-lower-than-expected-in-2024-but-risks-remain>[2025-05-21].

[2] Nussbaum A., "Le Pen's Party Unveils Economic Agenda ahead of French Budget", September 14, 2024, <https://www.bnnbloomberg.ca/business/international/2024/09/14/le-pens-party-unveils-economic-agenda-ahead-of-french-budget/>[2025-05-21].

抢烧事件。2024年7月29日，英国的南港镇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导致死亡的事件，引发十余年来英国最大规模的骚乱和暴力冲突，并席卷全国，反移民暴力抗议者和反种族主义抗议者相互攻击。在德国，近年来也出现了多起导致多人伤亡的严重事件。2025年2月13日，德国慕尼黑城区发生车辆冲撞人群事件，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28人受伤。据称，袭击者是一名24岁的阿富汗人，曾申请庇护但被拒绝。2025年3月3日，德国西南部城市曼海姆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重伤、5人轻伤。北欧国家向来较为稳定，但近年来骚乱、暴力事件频发。例如，在瑞典，2022—2023年激进分子焚烧宗教经典的行为多次引发暴力骚乱。

欧洲社会的激进化和极端化促使右翼势力崛起，而右翼势力的兴起又加剧了欧洲社会激进化和极端化的趋势。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欧洲国家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的数量较多，族群冲突时有发生。近年来，随着欧洲国家经济增速下滑，欧洲社会反移民情绪上升，刺激了右翼势力的兴起和发展。自2015年欧洲发生难民危机以来，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一直是欧洲国家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头等大事，所谓的主流政党开始更多地向右翼的反移民政策靠拢，欧洲社会整体对移民的态度显得更加不友好和强硬。这自然加重了移民群体的不满情绪，一旦出现轻微的风吹草动，就可能演变为骚乱和暴力事件。

（二）弱化欧洲战略自主能力

欧洲的力量源于其一体化进程以及持续地深化和扩大。欧洲一体化的前五十年，欧洲国家基本上是由中右和中左的主流政党轮流执政，尽管各成员国之间也有利益分歧和矛盾，但总体而言，相对容易形成共识，欧洲一体化无论在深化还是扩大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包括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欧元的创立等。然而，近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欧洲社会分化加剧、政治碎片化更加严重，特别是右翼势力的崛起，欧洲内部长期受到压抑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逐渐发展。

右翼政党普遍对欧洲一体化持较强的怀疑态度，批评欧盟的官僚主义，反对构建所谓的“欧洲主权”和“战略自主”，反对建制派和精英，主张本国优先。2016年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德国选择党于2013年成立的初衷就是推动德国退出欧元区，近年来更是主张德国效仿英国脱离欧盟。2025年2月23日德国议会大选，选择党的竞选纲领就包括德国退出欧盟和欧元区的主张，宣称“我们认为德国有必要脱离欧盟，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共同体”，这

个共同体将是一个较为松散的“主权国家的欧洲”，^[1]而非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2]尽管德国主流政党将这一主张视为异端邪说，但仍得到德国约21%选民的支持。同样，法国右翼的国民联盟也持疑欧立场，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认为欧盟“损害了法国的利益”，主张“法国国内法优先于欧盟法”，并主张改革欧盟机构，削减欧盟委员会的权力，将欧盟改造成一个“由具有鲜明民族身份的主权国家组成的联盟”。^[3]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国民联盟与德国的选择党持相似立场。在当前关于欧洲重新武装的讨论中，选择党和国民联盟等右翼政党普遍反对欧盟在防务领域趁机攫取权力。勒庞还反对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共享核威慑力量。

尽管右翼政党尚未在全欧范围内取得执政地位，但其民族主义主张已经开始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并对主流政党施加了日益增长的压力，限制了它们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的选择空间。面对日益严峻的内外挑战，当前欧洲迫切需要采取大胆的一体化举措。这包括建立一个真正的资本市场联盟、银行联盟、财政联盟，甚至防务联盟。这样的举措将使欧洲成为一个主权意义上的欧洲，一个具备战略自主能力的欧洲。只有这样，欧洲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力量，成为欧洲人民所期望的角逐者，而不是角逐场。然而，由于右翼势力的兴起，欧洲一体化进程变得更加艰难。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以来，欧盟从未尝试再次修改该条约，为欧洲一体化深化发展赢得更大空间，因为欧洲国家意识到，修改相关条约几乎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导致欧洲社会和政治层面更大的分裂。

（三）损害欧洲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当前，欧洲的堡垒化趋向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无论在投资还是贸易领域，保护主义的趋势都在增强；二是排外性上升，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日益强硬；三是持续削减对外援助，更倾向于独善其身。这些发展趋向，与欧洲内部右翼势力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

[1] Knight B., “Far-right AfD Party Wants Germany to Leave the EU”, December 18, 2024, <https://www.dw.com/en/far-right-afd-party-wants-germany-to-leave-the-eu/a-71093400>[2025-05-21].

[2] Ruyt D. J., “Is There an Escape from ‘Ever Closer Union’?” February 2018, <https://www.egmontinstitute.be/app/uploads/2018/02/EPB49.pdf?type=pdf>[2025-05-21].

[3] Dziubińska A., “Le Pen’s Vision of Foreign Policy”, April 22, 2022, <https://www.pism.pl/publications/le-pens-vision-of-foreign-policy>[2025-05-21].

1. 刺激欧洲经济保护主义

右翼势力秉持经济民族主义的立场，简而言之，即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右翼势力主张，在产业政策方面向本国企业倾斜，构建本国产业链，实现经济上的自主自足，同时反对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有害无益。因此，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右翼政党普遍主张加大投资审查，限制企业对外投资，以关税或非关税壁垒强化贸易保护。尽管右翼政党尚未在全欧洲范围内普遍执政，但通过进入政府和议会以及赢得更多选票，形成了在社会、民意和政治上的影响力，并进而影响本国政府和欧盟层面的经济政策。近年来欧盟通过的一系列立法，都具有很强的保护主义性质。例如，2023年5月17日生效的“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就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名义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旨在对进入欧盟的钢铁、水泥等所谓碳密集型产品征收额外关税。对于饱受气候变化之苦和经济发展之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无疑是额外的打击，显得尤为不公。其他法律如《外国直接投资安全审查条例》《外国补贴条例》《国际采购工具条例》《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的指令》《关于保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免受第三国经济胁迫的条例》以及《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都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旨在限制外国资本和企业，以保护本土企业和产业。

2. 增强排外情绪

欧洲各国的右翼政党在对待欧盟、欧洲一体化、全球化以及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罗斯政策上，立场存在较大差异，甚至持相反立场。比如芬兰、瑞典等国的极右政党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而德国的选择党则主张停止援助乌克兰、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但在移民问题上，几乎所有极右政党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即反接收难民和非法移民，特别是强烈反接收穆斯林移民。事实上，移民问题是右翼政党手中最大也最好打的“一张牌”。欧洲的移民问题日益严峻，未来似乎也难以看到好转的迹象，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一方面，欧洲人口日益老龄化，需要更多的外来劳动力；另一方面，欧洲的周边，尤其是其南部大周边中东、非洲等地，战乱和自然灾害持续不断，难民和潜在的非法移民群体日益扩大，并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欧洲。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趋势，为了争夺选票，弱化右翼势力的移民策略，欧洲各国和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态度普遍趋于强硬，事实上接受了右翼政党在移民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例如，采取加大边境巡逻、在境外设立收容中心等措施，使难民较难进入欧洲，并实施遣返和撤销居住许可等措施，使得难民在欧洲的居留变得更加困难。

3. 导致对外援助减少

右翼势力对所在国家和欧盟对外援助方面的影响力也日渐凸显。对外援助，是西方国家输出价值观、标准和规范以及获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渠道。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设有专门负责对外援助的部门，也有专门的预算保证。近年来，随着欧洲国家逐渐向右倾化方向发展，主要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对外援助持续遭到削减。当然，欧洲国家削减对外援助预算，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例如，经济不景气甚至负增长，出现“生活成本危机”，以及将较多资金用于援助乌克兰。不过，右翼势力的兴起和发展改变了社会氛围和政府决策，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削减对外援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般而言，右翼政党普遍对外部世界缺乏兴趣，反对对外援助。德国选择党和瑞典极右的民主党不但反对本国的对外援助，而且主张完全取消欧盟的对外援助。总体而言，过去几十年，欧洲左翼政府相较于右翼政府，在对外援助上表现得更为积极，相关预算也更多。但目前来看，即使是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在右翼思潮的影响下，也在削减对外援助。例如，工党执政的英国在上一届保守党政府已经削减0.2%对外援助预算的情况下，再度削减0.2%，将对外援助预算从占国民收入总额的0.5%降至0.3%，^[1]未来很有可能还会削减。

欧盟的堡垒化趋向，加大了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在经贸、宗教以及移民等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损害了欧盟的国际形象，也让欧盟在世界上更加孤立。这让欧盟在乌克兰危机等重大问题上争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支持变得更为困难。

民粹主义浪潮下的政党重组与跨大西洋裂痕

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随着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开启，美欧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2025年2月14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讲演中指责欧洲正悄然抛弃那些曾与美国共享的基本价值观，认为这比俄罗斯等外部威胁更令人担忧。^[2]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 Steinmeier）在当天的会议开幕致辞中则批

[1] “Britain Halves Its Foreign-aid Budget”, February 27, 2025, <https://www.economist.com/britain/2025/02/27/britain-halves-its-foreign-aid-budget>[2025-05-21].

[2]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Vance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remarks/2025/02/remarks-by-vice-president-vance-at-the-munich-security-conference>[2025-04-08].

评美国新一届政府的世界观不尊重既定的规则、伙伴关系和信任，表示“无法无天”绝不能成为世界新秩序的指导原则。^[1]作为西方世界的最主要组成部分，美国和欧洲在价值观和世界观上已然出现了巨大的分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欧关系曾经历了多次冲击，但都能在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安然度过。然而，在席卷美欧的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中，美国和欧洲的共同价值观念基础逐渐受到侵蚀。这种分歧是否会引起跨大西洋关系的裂变，值得进一步观察。本文基于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的逻辑从一个较长时间的视野对这一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探讨。

（一）政党格局的维度变化：从“上下”“前后”之争到“内外”之争

政党重组意味着旧政党格局的瓦解和新政党格局的形成。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党之间的竞争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如果社会群体冲突的维度发生改变，政党格局就会或早或晚地发生改变。从历史轨迹上看，西方国家的政党格局中先后出现了“上下”之争、“前后”之争和“内外”之争。

首先是基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上下”之争。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现代政党集中反映了阶级利益。最早一批无产阶级政党正是在19世纪下半期欧洲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正如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所言，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2]一般而言，工人阶级选民倾向于支持左翼政党，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选民则把选票投给右翼政党。

其次是基于传统价值观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前后”之争。作为前工业社会的“文化遗存”，与宗教紧密联系的传统价值观在大众政治时代仍构成选民认同特定政党的重要基础。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则发现，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不断增长的繁荣、受高等教育机会增加、更平等的性别角色和城市化进程导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一“静悄悄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推动了政党社会基础的重构。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研究人员、新闻记者、专业人员和文职人员成为左翼政党吸纳的对象，而大多数工人仍只关心物质问题，他们受教育较少、缺乏国际视野、不富裕、缺少安全感，因此更加崇尚

[1] “德国总统指责特朗普政府违反国际规则”，2025年2月15日，<http://www.news.cn/20250215/8737a5caf9e3465fb58c07c2bc2deb3a/c.html>[2025-02-15]。

[2]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 Inglehart R.,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传统价值观，从而可能成为右翼政党的支持者。^[1]

到了20世纪80年代，左翼政党的支持者既有工人阶级这样的“老左派”，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者这样的“新左派”；右翼政党的支持者既有资本家这样的上层阶级，也有崇尚传统价值观的工人。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社会支持基础相互交叉，使得两者的差异变小，从而推动主流左右翼政党趋向中间立场，分别成为中左和中右政党。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罗纳德·威尔逊·里根（Ronald W. Reagan）、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Margaret H. Thatcher）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所掀起的“超级全球化”使得既有政党格局难以反映新的社会分化。

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表明，一个国家充裕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要素的所有者从贸易中受损。在西方发达国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充裕要素，而低技能劳动力是稀缺要素。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而非熟练或半熟练的工人反对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超级全球化”中，只有前者的诉求得到了有效的回应。

根据丹尼·罗德里克提出的“世界经济政治三难困境”，在国际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三种目标中至多能够同时实现其中两种目标。^[2]在“超级全球化”中，各个民族国家为了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将国家政策尽可能与国际规范和规则协调一致，从而严重限制了大众参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者，西方国家积极推动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从中受益。西方国家主流的建制派力量即中左和中右政党均支持全球主义，反映了这些国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的偏好。在低技能劳动力的偏好没有得到主流政党回应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政党填补了这个空白，主张限制自由贸易和开放经济，并且以“人民”的名义强调“本土优先”。^[3]基于此，西方国家政党格局出现了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相争的新维度，即“内外”之争。

（二）欧洲与美国的政党重组：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之间的分化

作为一种“薄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认为社会最终将分裂成两个内部同质

[1] [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 Rodrik D., “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4 (1): 181, 2000.

[3] 田野：《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

但相互敌对的群体——“纯粹的人民”反对“腐败的精英”。^[1]因此，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反精英、反建制。但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发生在政党格局“内外”之争凸显时，民粹主义者作为本土主义的倡导者还在不同程度上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反对外援助、反国际组织。这些诉求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比如，丽莎·德尔穆思等学者基于多国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大众比精英更少认为国际组织具有合法性，并指出，这种精英一大众差距是由两者在特征上的系统性差异导致的，这些特征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政治价值观、地理认同和国内制度信任等。^[2]随着西方国家全球主义者与本土主义者之间的“内外”之争日益凸显，欧洲和美国近年来都发生了政党重组。

1. 欧洲的政党重组

欧洲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发源地，也是政党“左右之别”的发源地。但在积极推动和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内外之争”重塑了欧洲政党政治，出现了中左和中右的汇合、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汇合。从全球化受益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要素所有者为中左和中右的汇合提供了社会基础，而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以工人、失业者为主的社会下层为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汇合提供了社会基础。

一方面是中左和中右的汇合。中左和中右政党作为左翼和右翼的核心力量相互对峙，曾是欧洲政党格局的基本特征。但随着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效应日益显现，中左、中右从政纲接近走向联合执政，甚至建立新的中间派政党。在德国，社民党和联盟党作为两大“全民党”，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轮流执政，分别推出偏重公平的左翼政策和偏重效率的右翼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两党相互靠拢，其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政府时期（1998—2005年）社民党的右倾化，施罗德政府全面改革德国福利体系和就业体系的“2010议程”，反映了社民党的社会经济政策向右翼靠拢；（2）默克尔（Angela D. Merkel）政府时期（2005—2021年）联盟党的左倾化，默克尔领导联盟党向社民党以及绿党的政策靠拢，集中反映在欢迎难民、废除核电以及接受文化多元主义等左翼政策的推出；（3）后默克尔时代两党执政的“接力棒”或“粘合剂”，无论是自我标榜还是选民认可，社民党的奥拉夫·朔尔茨（Olaf

[1] Mudde C.,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Dellmuth L., Scholte J. A., Tallberg J. and Verhaegen S., “The Elite-citizen Ga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6(1): 283–300, 2022.

Scholz) 在 2021 年大选中都被视为默克尔的接班人, 而联盟党的弗里德里希·默茨 (Friedrich Merz) 在 2025 年大选后的组阁谈判中接受了社民党的核心诉求, 通过修宪突破了“债务刹车”机制的约束, 可以说完成了朔尔茨未竟的事业。在法国, 社会党和共和党作为左右两大政治力量曾长期轮流执政, 但在 2017 年和 2022 年两届大选中两党候选人均被淘汰出局。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共和国前进党 (之后改名为复兴党) 重组了传统左派和传统右派中偏向中间的势力, 其成员分别来自社会党右翼和共和党左翼, 从而将中左和中右力量合并, 组建为新的中间派政党。

另一方面是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汇合。基于左右之别的历史, 左翼民粹主义强调下层阶级的经济利益, 右翼民粹主义强调基于国族、种族、宗教身份的保守价值观, 在政治光谱上分属极左和极右两端。但基于选民基础的重合, 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并非决然对立, 可以通过三种形式相互接近: (1)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借用左翼的阶级话语动员选民支持, 比如法国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呼吁“消除对本国工人的冷漠”, 偏离了传统的右翼立场, 要求国家为社会分配承担更多的责任; (2) 左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迎合右翼的反移民主张来获取选民支持, 比如 2024 年从德国左翼政党分离出来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立场, 将移民和难民视为争夺就业、住房等社会资源的竞争因素, 主张限制移民和难民规模, 以致被界定为“左翼保守主义”这一令人费解的新政党类型;^[1] (3) 对左翼和右翼选民分别进行纲领供给、行走于左右之间的“混合民粹主义”, 比如意大利“五星运动”, 一方面主张扩大社会福利、加强市场管制和保护环境来吸引左翼选民, 另一方面又通过反移民和疑欧主义吸引右翼选民。^[2] 尽管极左和极右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依然很大, 但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正走向相互接近。

2. 美国的政党重组

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政党重组。20 世纪 30 年代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新政”所塑造的政党格局中, 民主党成为代表劳工利益的政党, 而共和党则被视为代表资本利益的政党。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 民主党开始拥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而共和党坚持传统价值观。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

[1] 伍慧萍: “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分裂与蜕变: 以德国为例”, 《世界社会科学》, 2024 年第 6 期。

[2] 田野、李存娜: “全球化冲击、互联网民主与混合民粹主义的生成——解释意大利五星运动的兴起”, 《欧洲研究》, 2019 年第 1 期。

治分野基本体现了政党格局的“上下”之争和“前后”之争。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超级全球化”中，美国两党的格局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不但里根的共和党政府发起了以减税、削减福利和放宽管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且走向“第三条道路”的威廉·杰斐逊·克林顿（William J. Clinton）总统引领民主党利用冷战结束的契机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1992—2016年的24年间，克林顿和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 Obama）两任民主党总统执政16年，其推行的全球主义政策有利于高收入、高教育程度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所有者，但损害了低技能劳动力。

面对民主党对劳工的“背叛”，以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赢得“铁锈州”选举人票为起点，美国共和党积极重构其选民基础。共和党不仅依赖传统价值观来吸引受教育程度低、更多关注物质问题的选民，而且通过实行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政策来获取低技能劳动力的支持，劳工阶层从民主党的支持者变成了共和党的基本盘。2024年大选结果表明，特朗普不仅能够吸引白人蓝领工人的选票，而且能够吸引拉美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工薪阶层的选票，从而构建了跨族裔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选民联盟。^[1]随着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维度上出现了显著的分化。

（三）欧美政党重组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

随着2025年3月德国大选的尘埃落定，2024年西方主要国家“超级选举年”及其时间延长线告一段落。特朗普的回归意味着右翼民粹主义很可能主导美国的政治周期，在历史进程中“绕道的是拜登，而不是特朗普”。^[2]而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的议会选举虽然面临民粹主义势头上升的压力，但建制派的中左、中右或中间派政党基本上稳住阵脚，主导了新政府的组建，对极右翼政党的“防火墙”机制仍然有效。本土主义的美国与全球主义的欧洲从未如此反差巨大地共存于世界政治版图之中。这种显著的差异对跨大西洋关系至少会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特朗普政府积极支持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抨击和指责欧洲建制派，使美欧之间的纷争出现了一个新维度。作为本土主义的倡导者，完成“特朗普化”的美国共和党与德国选择党、英国改革党、意大利兄弟党、匈牙利青民盟

[1] 谢韬：“2024年大选与美国政党政治变局”，《当代世界》，2025年第1期。

[2] Kimmage M., “The World Trump Wants: American Power in the New Age of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104(2): 15, 2025.

等欧洲极右翼政党志同道合，同气连枝。《外交政策》2025年第1期载文指出：“这些政党指责全球主义精英在向商品开放边境的同时，却保护自己的服务行业；指责多元化和包容性官僚体系向那些被认为能力不足的人敞开大门，却对择优录取的人才关闭大门；指责跨国公司在鼓吹开放边境的同时，将投资转移到成本最低的国家；指责外国制造商一边利用自由贸易，一边实施欺诈行为。”^[1]为共同推进反全球化的议程，特朗普政府力图构建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联盟。意大利极右翼的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成为唯一受邀出席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的欧盟国家领导人。万斯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时正值德国大选前夕，他拒绝会见社民党籍的德国总理朔尔茨，而会见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在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把选择党界定为“明确的右翼极端主义”并将据此加强对其监控后，特朗普政府激烈抨击德国，万斯甚至指责德国建制派重建了“柏林墙”。对欧洲国家来说，不仅其国内选举有可能受到美国这一外部力量的干预，而且其多年形成的“政治正确”也会面临美国的质疑和挑战。

第二，面对美国对盟友关系的漠视，欧洲建制派更加积极地寻求欧洲战略自主。欧洲战略自主涉及多个领域，核心在于防务自主。^[2]尽管在能源、技术、产业链等领域也有自主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在经济相互依赖中形成的，而防务自主问题则源自欧洲对美国安全保护的单方面依赖。随着美国的本土主义转向，控制跨国人口流动的边界安全以及加拿大、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等被认为对美国本土安全具有更重要价值的地区成为美国优先关注的对象。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的“白宫争吵”以及在乌克兰危机上对欧洲的“越顶外交”，提醒欧洲需要为美国不再担负安全保护责任做好准备。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提出了“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拟调动8000亿欧元来打造“一个安全而有韧性的欧洲”。马克龙表示法国将考虑使用自己的核力量来保障欧洲安全。默茨则不惜违背选举前财政审慎的承诺，选举后和社民党、绿党携手通过宪法修正案，使德国联邦政府在国防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时可通过举债筹集资金。欧洲建制派政治家已不再将特朗普执政看作“插曲”坐等“常态”回归，而是开始为应对美国的本土主义进行长期的规划和安排。

[1] Rajan R. G., “Walled Off: On Trade and Immig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Is Following a Worldwide Trend”, *Foreign Policy*, Winter 2025.

[2] 冯仲平：《欧洲战略问题及中欧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

第三,美国试图颠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欧洲努力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美欧之间全球性合作的基础开始发生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共同缔造者。正是在欧洲国家的“邀请”下,美国从孤立主义全面转向了国际主义,并承担起重建西方世界的责任。^[1]这一秩序帮助美欧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并且冷战后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但特朗普认为美国在这一国际秩序中“吃亏上当”,不愿意再给予支持。在这一秩序下,日益增长的贸易和移民加剧了美国低技能劳动力的困境,而这一群体恰恰是特朗普的主要选民基础。^[2]在其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就通过退出某些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方式来表达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认可。在第二个任期开启后,特朗普摆脱了国内建制派的掣肘,以更大力度颠覆这一国际秩序,并以双边交易为路径构建对其有利的新国际秩序。2025年4月特朗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战就体现了上述意图。但欧洲作为自我定位的“规范性力量”和“市场性力量”,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有深刻的认同,力图维护这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对“以交易为基础的國際秩序”的追求和欧洲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捍卫凸显了美欧之间的对立。

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美欧关系出现了裂痕,那么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伊始,美欧之间就在政治价值观、战略安全和国际秩序这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上产生了显著分歧,加深了跨大西洋裂痕。这一趋势接下来的演变不仅将决定作为整体意义上的西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延续,也将决定未来的多极格局以何种面貌呈现。■

(责任编辑:邱静)

[1] Lundestad G.,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3(3): 263–277, 1986.

[2] Flaherty M. T. and Rogowski R., “Rising Inequality as a Threat to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2): 495–523, 2021.

The Rise of Global Right-wing Wave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Li Xiangyang, Zhou Qi, Ding Yifan, Zhang Jian and Tian Ye

9

Populism has emerged rapidly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recent years, encompassing both left-wing populism and right-wing populism that feature nationalism and anti-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exacerbatio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equality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anti-globalist narrative logic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ory constitute the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roots of the rise of right-wing anti-globalism, while the status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determine their cognitive disparities toward anti-globalist ideas. The rise of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s not only disrupted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ecosystem but also brought multidimensional impacts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landscape through policy shifts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profoundly altering the logic of long-te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rade fragmentation and supply chain restructuring have systematically weakened global growth momentum, and the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promoted by populist forces has caused structural damage to the world’s long-term growth potential. Furthermore, as the fight between globalists and nativists intensif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political party realignments have occurred in both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cent years. In Europe, convergence of center-left and center-right parties and that of left-wing and right-wing populism have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have shown significant polarization regarding globalism and nativism. Trump’s new policies have not only completely reversed the previou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the Democratic government, bringing tsunami-like impacts on US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t also triggered serious refle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have been seriously at odds with each other on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such as political values, strategic secur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us deepening the Transatlantic rift.